

文章编号:1671-6523(2011)02-0065-06

农村社区精英功能的维持与变迁

——基于对江苏省射阳县黄沙村的调查

陈文娟 苏振芳*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建设日益凸显其重要地位。根据这一背景,以黄沙村为个案,介绍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社区精英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分析农村社区精英在社区治理及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根据黄沙村的实际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农村社区;精英功能;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Functions of the Rural Elites , the Maintenance and Changes ——A Stud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Huangsha Village of Sheyang County in Jiangsu Province

CHEN Wen-juan , SU Zhen-fang*

(College of Public and Administration ,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 Fuzhou 350007 ,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 community build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ased on this reality , the paper conducts a case study of the Huangsha Community , introducing the role the community elites play in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Meanwhile , it points out th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building.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rural community; elites' functions; changes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涌现了一大批活跃在农村生产活动各个领域的乡村精英,他们具有特殊的才能、优势和

本领。这些乡村精英的产生为农村的生产生活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是影响农村发展的一个特殊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农村问题的不断深入,农村精英逐渐成为农村问题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传统中国农村精英地位和功能逐渐成为一个基本问题域。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给功能下了一个客观定

收稿日期:2011-03-10 修回日期:2011-04-05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0B079)

作者简介:陈文娟(1988—),女,硕士生,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研究,E-mail:happist1008@163.com;* 通讯作者:苏振芳,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suzhenfang@vip.sina.com。

义:功能是“有助于既定系统的适应或调整”的“可观察的结果”^[1](转引)。同时他又提出了“反功能”、“显功能”和“隐功能”的概念。

对于农村社区精英功能的研究,我们不仅要注重其正功能的发挥,也不能忽视其存在的反功能。另外,我们也要对农村社区精英功能的变迁加以探析,以便能够让我们对农村社区精英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对农村的发展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美国学者杜赞奇^[2]在其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认为,20世纪上半叶农村精英的地位和功能从“保护型经纪”向“赢利型经纪”。正是受其观点启发,笔者决定尝试着探析一下自己生活了21年村子中的乡土精英的功能在这30年时间里维持与变迁情况,以便进一步探讨农村社区精英在新农村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农村精英的相关概念界定

(一) 农村精英的界定

很多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社区精英做过专门研究,所以正如贺雪峰教授所认为的,村庄精英已成为一个“陈旧”的学术话题了。包括贺雪峰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村庄精英的概念属于社会分层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分层标准的不同,农村精英也代表了不同的群体。贺雪峰^[3]指出,“在传统社会,社会分层是以土地、权力、声望三维因素进行的,因此,地主、宗族领袖、儒生以及将三者集于一身的乡绅广泛存在。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构造了阶级身份的概念和阶级分层的假象,并形成了以阶级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主要是以政治身份和政治资源为基础的分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党员、干部、贫下中农、‘五类分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个体户、专业户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农村能人,事实上即经济精英。农村的社会分层中引入了经济的因素。”

社会学家帕累托认为,社区精英可以定义为社区中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的社区成员,他们往往是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的个体或群体^[4](转引)。显然,这是根据社区成员所占有的资源以及资源的重要性来界定精英群体的。

贺雪峰^[5]还认为,“所谓村庄精英,就是村中掌握优势资源的那些人,因为掌握优势资源,而在村务决定和村庄生活中,具有较一般村民大的影

响。”可见,贺雪峰所认为的优势资源、一定程度的成功和社会影响力是衡量乡村精英群体的三个重要因素。

(二) 农村保护型精英与赢利型精英的概念界定

笔者认为农村保护型精英是传统精英的一种,他们是一批在乡村社会生活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积极功能的精英个人或精英群体,他们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符合村民的期待。而农村赢利型精英则产生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批精英类型,是一批在乡村社会生活以及乡村治理中以自身经济利益为目的、发挥的社会功能与村民的利益相违背、其社会行为与社会角色不相适应的个人或群体。

(三) 农村精英的分类

帕累托把精英类型划分为狐狸型和狮子型两种:前者属于机巧型的,这种类型的精英求变求新,希望变革;后者则属于稳重型的,他们享受安稳的生活积聚财富而不希望变革。

贺雪峰把当代乡村精英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两大类:传统型精英是指那些以名望、地位等为前提而形成的乡村精英,构成此类精英的人物往往具有既定的身份和品质,比如党员身份、在外当过兵见过世面、曾参与村务决策的村民等;所谓现代型精英是指在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的经济能人,如种养大户、私营企业主、建筑包工头等。项辉等人把乡村精英按其影响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他们认为乡村的改革使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崛起的一大批经济能人成为了乡村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指的是那些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等功能的人,如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代表的村干部,还包括在群众中具有较高声望并热心政治的村民;社会精英属于传统型精英,指的是那些在人品、能力、经验、威望高于其他社区成员的人,他们是在社区人际交流和互动中产生的,并通过社区成员相互评价而区分出来的。

目前国内学术界最流行的是把乡村精英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或治理与非治理两大类。金太军、贺雪峰、仝志辉等人认为体制内精英指的是国家权力序列之内或得到国家基层政权认可的乡村精英,主要是指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干部;体制外精英是各种以乡绅和宗族家族势力为主导、国家权力序列之外的精英,主要包括宗族精英、宗教精英、宗派势力、经济能人以及一些民间知识丰

富、懂得乡间礼仪、能主持乡间仪式的文化精英和有威望的乡村中学教师、医药师等。

三、研究过程

(一) 研究方法

笔者通过实地调查,运用深入访谈的方法,从村民口中得到第一手感性材料。同时又以文献研究为辅,参阅大量相关著作和文献资料,对研究问题有了更深的理性思考。此次调研共访谈了18位村民,历时1个多月,在访谈过程中,笔者认真详实地记录了每位被调查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重要的是,笔者严格要求自己遵守作为一名调查员的相关原则与立场,并且灵活运用一些调查和访谈技巧,确保调查结果真实、可靠、有效。

(二) 研究对象

黄沙村处于射阳县西边缘地区,与阜宁、武滩、沟墩接壤,属于粮棉杂种区,水陆自然条件良好,地处江苏的里下河平原地区。黄沙村现有人口1800多人,男女性别比例基本持平,女性比男性多二三十个人。在黄沙村的人口中,0~20岁的约占总人口的30%;21~60岁(不含60岁)的约占总人口的50%,60岁及以上的约占20%。黄沙村村民中,大约有60%以上的是初中及以下学历,高中及中专学历约占总人口的3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约占10%。

而此次被调查者的年龄结构为30~70岁的中老年者,选择此年龄段的村民进行访谈是因为他们年长且经历丰富,对该村的情况比较熟悉。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2/3初高中文化;被调查者的职业结构:养殖户1人,从事文化礼仪活动的“忙人”1人,村干部(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2人,退休教师4人,其余均是一直从事田间耕作的农业劳动者。

四、黄沙村精英功能探析

(一) 黄沙村的精英主体逐渐趋向多元化

“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中,绅权是非常重要的权力之一。代表绅权的士绅是地方权威的代表者,他们使国家的行政权和乡村自治权融为一体,是传统乡村自治政治的重要纽带”^[6]。士绅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的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群体,其生活水平、文化程度、身份地位与农民形成强烈的反差。据村里的老人们讲,黄沙村在过去主要是依靠士绅治理乡村的。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黄沙村的精英主体逐渐趋向多元化,除了政治精英外,社会精英和经济精

英也大量涌现。与全国大多数的农村一样,黄沙村的政治精英是那些国家权力序列之内或得到国家基层政权认可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干部,是属于体制之内的;黄沙村的社会精英有退休老教师及在村中很有威望的其他人;目前黄沙村能够称得上经济精英的有3位,2位个体工商户,1位私营企业主,这些人在自己富裕之时运用自身资源帮助周围的村民。

为了维持村庄治理和乡村秩序,精英主体多元化必然带来各种精英主体之间的互动,也会出现农村社会权威结构的变迁,这在黄沙村也有所表现。同时,改革开放后,黄沙村具有绝对领导权的政治精英逐渐兼具经济精英的特质了,他们的经济基础、生活水平在村中遥遥领先。这种经济精英向政治精英的流动以及政治精英趋向经济精英的现象存在于中国目前大多数的乡村社会中。“不同农村精英之间的相互流动,不是转型期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中的独特现象,而是贯穿于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全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农村精英之间的流动状况,取决于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资本的自身积累和转化能力,并最终形成同一农村精英角色拥有多种比较优势的资本、兼有多种精英角色的现象”^[7]。

(二) 黄沙村“保护型”精英的分类及其作用

1. 保护型的社会精英。虽然如同全国大多数乡村中的各类精英一样,黄沙村各类精英的角色、地位和功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相互流动,但是仍维持着黄沙村传统的一些特征。

杜赞奇以“经纪模型”去分析20世纪上半叶农村精英地位和功能的转变。在笔者的理解中,“经纪”一词类似于“代理人”,是联结村庄与地方政府的桥梁。正如贺雪峰^[3]所认为的,“村庄精英一般都具有村庄特色”。在此,笔者以“保护型”精英来探析黄沙村某些特定的村庄精英在这30年来持续扮演的保护人角色——所谓的正功能。

案例一:陈家老太,女,74岁,一儿七女都已成家立业,此人在村中说话很有权威性。其夫姓陈,我们都尊称其老太爷,是黄沙村陈姓中辈份最大的,老太爷身体好时在村中也具有很大威望,自从几年前生了一场大病瘫痪在家后,权威逐渐转移到其妻身上,也就是陈家老太。无论是在普通村民还是在村干部中,只要老太发话没有人敢不听的,即使有反对意见也不敢公开提出。一来和她外向开朗的性格有关,二来与其家族威望有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老太说话做事有理有据,

村民们信服她。虽然她不为官也不算富有,但不可否认的她是黄沙村的精英——社会精英、体制外精英、非治理精英。

像陈老太这样发挥强大作用的保护型社会精英在黄沙村还有好几例。时势造英雄,也许像老太就是特定时期特定事件中造就的村庄精英,她关心集体利益,赢得了村民的一致尊重以及对她特定身份和权威的认同。正如曹锦清^[8]先生所说“在村落文化内部,有时会孕育出一种‘能管事’且‘有办法’的人物,这种人物决不是村民协商选举的,而是自己冒出来的,这种人物一旦产生,他有能力认识全村的共同利益,并有能力带领村民去实现这种共同利益。这种人物越是无私,越是能代表共同利益,便越能赢得村民的信赖与尊重,从而凝聚起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他的威望与智慧成为公共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

笔者认为陈家老太就是这样一种“能管事”且“有办法”的人物,她也是“冒”出来的,她的权威形象的出现离不开她所处的大家族的威望以及她年轻时对村务的耳濡目染(需要说明的是,以前生产组的会议以及各种讨论事宜都是在陈老太爷家开展的)。值得欣慰的是,她能够把这种优势运用到维护集体利益和村庄的秩序维持上。

2. 保护型的经济精英。中国农民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使农村孕育了众多的农业大户和经济能人。农村经济能人这一新兴社会群体具有特殊的社会影响力,对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案例二:吴先生,男,39岁,个体户,目前在黄沙村公路头经营2个超市、1家浴室、1个小餐馆、1个熟食店、1个五金电器部,由于名声和信誉好,所以每天来此消费的村民不断。

以上笔者是从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来讲述这位经济精英所发挥的保护功能,下面笔者将从具体的合理配置劳动力方面讲述吴先生所做的贡献。

吴老板经营这么多项目必然需要一定的人手。除了兄弟、七大姑子八大姨子在店里帮忙外,吴老板还招聘村里剩余劳动力去店里工作。他一共在村里招了3个人,2个小学文化但口齿伶俐的小姑娘当售货员,1个腿稍有残疾但老实能干的中年男子专门负责熟食部。3个人每月工资1000元左右,一日三餐吃店里的,这在黄沙村已经是不错的收入了。同时吴老板还利用自身丰富的人脉资源,为村里一些待业青年在镇里介绍一

些合适的工作。吴老板的这种为村里人服务的意识加深了村民对他的信任,扩大了他的群众基础。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和扩大了他的顾客来源,使得他这几年一直财源滚滚,店越开越大。

笔者以吴老板这一典型案例为例,旨在说明虽然黄沙村正处在传统向现代逐渐变迁的过程中,村民的社会心理越来越理性化,而作为做生意的人——商人更被贴上了“算计”、“小气”、“理性”、“精明”、“赢利”的标签。但是在黄沙村的转型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身上散发着独特魅力的能够为村民和村庄谋利益的生意人——经济精英。农村经济精英的根在农村,他们具有特定的乡土文化意识,注定了他们要为农村社区负担一定的责任。他们的保护功能角色用得恰到好处,达到了双赢的效果,这何尝不是一种村庄和谐呢?

3. 保护型的政治精英。笔者这里提及的政治精英即村干部。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农村政治精英的角色具有模糊性和双重性,他们扮演的是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人和家庭代言人三者于一身的角色^[9]。他们往往徘徊在“保护型国家经纪”与“赢利型国家经纪”角色冲突的阴影中。然而笔者想说明的是,在黄沙村仍存在专门发挥“保护型”功能的政治精英,这类人的数量少之又少,以至于在拥有强大力量的“赢利型”政治精英的阻碍下,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微弱。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具有特殊性。的确,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点,在黄沙村仍存有一些为村民着想的干部着实让人十分欣慰,而这类人往往都是些年迈的没有利益追求与冲突的干部。

4. 黄沙村保护型精英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作用的具体表现。第一,保护型精英是乡村规范和道德舆论的维护者。社会规范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化过程中所建构的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它反映着共同利益和集体利益。詹姆斯·科尔曼认为,在集体内部,命令式规范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类规范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依集体利益行动。这类规范总是得到社会的支持而强化^[10]。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彼此熟识或半熟识。普通村民对于乡村精英,乡村精英对于普通村民,彼此之间有一杆衡量的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村民可以依据共同的标准确定谁是他们心目中公认的好精英——保护型精英。同样地,乡村精英也可以衡量哪个村民顾全大局,哪个自私自利。往往命令式规范在有显赫声望和权威的社会精英那里是十

分奏效的,他们利用自身有分量和有说服力的话语权在乡村形成道德约束力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以规范那些不良的乡风和行为,从而维护着乡村规范和乡村利益。

第二,保护型精英是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者和拓展者。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人以及乡村社会资本的体现,乡土社会中,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外乎局限于亲戚、邻居这些初级社会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的渗透,村民之间传统的社会关系逐步解体,有些村民走出农村奔向城市逐渐扩展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了朋友圈、同事圈等。然而这些总是小部分,大多数的村民还没能够建立起现代的社会关系。黄沙村乡土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他们网络规模大,处于农村社区网络的顶端,与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关系纽带,毫无疑问地,他们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有利地位。“个人在社会网络中所占据点的位置越高,那么他对整个结构的了解就越多,而且他对其他点的可通性较大,即可涉取社会资源的点越多。由于整个社会被看成是一个人际关系网络,那么每个点可通达其他点的点数不一致,而且对其他点的影响强度也不一样,这样每个点可以利用其他点的资源也不同”^[11]。正是黄沙村的保护型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能够处于这样的“高位置”上,才使得村民以及黄沙村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拓展成为可能。

第三,保护型精英是乡村社会整合的促进者和拓展者。社会整合也即秩序问题。而秩序问题又离不开社会团结——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研究的主题。“社会团结是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调、一致、结合的关系”^[11](转引)。黄沙村的各类保护型精英在共同促进着乡村社会的团结和整合,这也离不开村民与村民、村民与精英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梅塞尔认为,绝大多数农村精英具有用“3C”来阐述的核心要素,即“意识(consciousness)精英成员自觉地意识到精英的存在及其自身在其中的成员资格;凝聚力(coherence),即个体成员的行动必须与群体利益的诉求相一致;共谋(conspiracy),即成员间必须要有信息交换,共同的策略必须不断演变,以增进群体利益”^[11]。黄沙村的保护型精英就具备“意识”和“凝聚力”这些要素,运用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去增进村民之间的合作,增进村民对精英的信任,使得村庄秩序得以维持,村庄整合得以实现,最终达到了较高的“村庄社会关联度”^[5]。

(三)黄沙村“赢利型”精英的产生及其作用

1. 黄沙村“赢利型”精英功能的变迁。“赢利型”精英是相对于“保护型”精英而言的。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普通村民身上,同时也表现在干部身上,在黄沙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不免发生了一些政治精英的保护型功能逐渐向赢利型转变了。正如杜赞奇^[2]所说的“保护型经纪体制的含糊职能在影响着文化网络本身。尽管这种保护型体制由乡村社会领袖们所创建并赋予其集体价值观念,但它极易受赢利型经纪的操纵。”

2. 黄沙村“赢利型”精英突出存在的问题。第一,思想保守,缺乏创新的思想意识。黄沙村的村干部思想僵化,不懂得积极引进外资、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工业项目等。第二,缺乏维护村内公共财产的意识。村干部们对公共财产的概念弱化了,对村里的公共设施缺乏保护和建设的意识。第三,只顾搞政绩和形象工程,不顾村民和村庄的实际情况。这次拆迁搞平田整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第四,干群关系恶化。村民们普遍认为现在有些干部遇到困难怕出头,以前村里的干部是铁面无私,而现在的普遍现象是干部问事的少了。第五,自私自利,以“己”为中心,而不以“民”为本,这是最严重和最突出的。众所周知,社会发展必须具有持续性,而黄沙村60年代的规划,现在又重新来,一个干部一个路子,使得整个规划缺乏连续性。

(四)黄沙村精英功能变迁的原因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最首要的原因在于这些政治精英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从社区守望人的角色转变成了赢利者的角色。“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社会控制出现了松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自由政治空间’——即体制内精英(村干部)可以按照自己个人的利益来安排村庄的实际事物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度。这一空间的存在是与体制内精英地位角色的模糊性相对应的”^[12]。正是在这个自由政治空间里,村干部们看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改变了以往一些老干部服务村民,建设村庄的理念,转向为自己谋取切实的利益——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同时制度的不完善给了他们变迁的空间和钻孔的缝隙。第二个原因,体制内精英(村干部)处于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边缘地位,也正好处于乡镇权力、普通民众两个系统

利益一致结合点和利益矛盾的触发点上。“他们一方面拥有相应的职位所界定的政治身份,是村民的代言人,采用非行政手段治理乡村;另一方面在实际运行中,他们带有明显的‘政府化’倾向,即事实上成为乡镇政府在农村的进一步延伸,担任着上级政府对应的职能”^[12]。现在黄沙村的干部除了书记和会计都是中青年,时代在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不甘于在农村做一辈子小干部,为了向上升迁,他们必然会讨好上级,从而牺牲农民利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赢利型”精英。

(五) 如何解决黄沙村精英功能变迁带来的问题

第一,建立乡村事务村民共同参与、共同决策机制,变“自由政治空间”为公共空间,实现村庄精英以村民的利益来安排村庄事务。

第二,加强村民之间互相合作与信任,提升村民对村庄精英的舆论监督意识。对于村庄精英的违纪违法以及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要勇于并敢于揭发,同时村民应认识到自己有反对不称职的干部继续任职的权利。

第三,建立各类精英内部之间的互动和监督机制,实现精英与精英之间的流动,任能为贤,提高精英办事效率,激发精英的创新思维与创新意识。

参考文献:

- [1] 宋林飞. 西方社会学理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23-31.
- [2] [美] 杜赞奇. 王福明, 译.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3] 贺雪峰. 村庄精英与村庄记忆: 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J]. 社会科学辑刊, 2000(4): 36-37.
- [4]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286.
- [5]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 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59-160.
- [6] 于建嵘. 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88.
- [7] 胡杨. 中国农村精英研究的问题域及其整合[J]. 河南社会科学, 2006(1): 11-15.
- [8]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123.
- [9] 吴清军. 乡村中的权力、利益与秩序——以东北某“问题化”村庄干群冲突为案例[J]. 战略与管理, 2002(1): 5-17.
- [10] [美] 詹姆斯·S·科尔曼. 邓方, 译.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364.
- [11] 蔡禾, 张应祥. 城市社会学: 理论与视野[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 137-83.
- [12] 叶本乾. 村庄精英: 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J]. 甘肃理论学刊, 2004(6): 60-61.

第四,实行村干部向上流动由村民民主推选机制。针对目前黄沙村有一部分年轻干部急于升迁、实现向上流动的现实,应改变上级直接任命的方式,把权力交给村民,让村民选出符合自己心中标准的精英。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一些精英为民着想、为民办实事,在村民中留下好印象——所谓戈夫曼的“印象管理”。

五、结 语

乡土精英的研究,关乎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黄沙村乡土精英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功能方面的维持和变迁,虽不能代表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农村精英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很欣慰黄沙村还存在着一些能实实在在为村民谋利益的传统保护型精英,他们为黄沙的发展、稳定及和谐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现实利益的驱使和诱惑,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政治精英违背了社会道德与规范,损害了村民与集体的利益。因此,大力发挥农村社区精英的正功能,是农村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是构建和谐农村社区的重要保证。

(责任编辑:康兰媛,英摘校译:吴伟萍)